



她助中国作家走向世界

10月21日,著名美籍华裔作家、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家中去世,享年99岁。她被誉为“世界文学组织之母”,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,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失去的金铃子》《千山外,水长流》《桑青与桃红》等。对自己的一生,聂华苓曾形容:“我是一棵大树,根在大陆,干在台湾,枝叶在爱荷华。”

战争留下创伤

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武汉,其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,父亲聂泮在桂系担任要职,一度遭国民党追捕,后被枪杀,聂家就散了。讲起来,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。13岁前,她和弟弟整日穿梭于日租界、德租界、法租界、英租界,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,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永难磨灭的伤痕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,母亲孙国瑛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。作为一名新式女性,孙国瑛深知读书的重要性,因此即便外头烽火连天,她也执

意要送聂华苓到外地求学。然而,抗战胜利后,又爆发内战。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,于是她拖着母亲与弟妹去了台湾。那年,她24岁。

为自由而呐喊

到了台北后,因一个偶然机会,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、雷震主持的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,任文艺栏主编。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,譬如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、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,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,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。

同时,《自由中国》在雷震的带领下,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,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

的文章。聂华苓跟随着雷震等人,为自由而呐喊,然而,“自由中国”并没让她看到自由。因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,随后《自由中国》被封,聂华苓身为编辑虽躲过牢狱之灾,却终日受到监视。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:事业遇阻,弟弟、母亲过世,婚姻和经济也陷入死局。

让中国作家走向世界

厄运随着聂华苓38岁那年遇到第二任丈夫保罗·安格而而终结。安格对她一见钟情,他们婚后在美国爱荷华筑起爱巢,一起划船、烤肉、谈文学,与鹿和浣熊做伴,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。过往的痛苦与恩怨,也终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。也就是在那时,聂华苓和安格促成了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该计划每年会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。

身为中国人,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。彼时,中国作家想出国,都

会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。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,聂华苓自己每年都捐款。除了捐款,聂华苓还竭尽所能地帮助每一位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回忆称,因不懂外语,他一出国门就紧张。为此,聂华苓特意为他写了一张英文的“护身符”随信寄给他。那“护身符”上写着:“我是中国作家莫言,来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,我不懂英文,希望您能帮助我。”有了聂华苓给的“护身符”,莫言心里终于踏实了许多。

不想,就因为不懂英语,莫言签证还是被拒了。于是,聂华苓再次出面,让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系,还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给使馆发了邮件,终使莫言顺利拿到签证到美。就这样,几十年来,“写作计划”共邀请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,而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100多位。

对故土与母语的眷恋,始终是聂华苓难言之痛。1970年,她与安格共同翻译了《毛泽东选集》。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,他们还翻阅了很多中国革命的书藉。(综合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世界华人周刊》)

1880年3月,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(著名爱国侨领)从母亲手中接过50块银币,从广东开平步行至香港,之后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旧金山。经乡人介绍,司徒美堂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做杂工。当时,美国人经常欺负华侨,吃“霸王餐”不说,还找茬讹钱。一日,几个美国地痞又来滋事,从小学过武术的司徒美堂义愤填膺,以一对十,还一拳将一个美国人当场打死。第二天,司徒美堂被警察带走。司徒美堂教训了美国人,这让总受欺负的华侨们感到大快人心。为了保全司徒美堂的生命,当地洪门致公堂发动华侨华工募捐,凑钱为司徒美堂请了律师,他就是当时刚刚法律系毕业,后来成为美国总统——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。罗斯福据理辩护,广大侨团也与美国人斗智斗勇,最终司徒美堂在被囚禁十个月月后得以获释。

1885年,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,加入了洪门致公堂。1905年,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,并聘请罗斯福担任法律顾问近十年,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19世纪80年代,美国曾多次颁布“排华法案”,广大华侨社团纷纷向美国政府写信要求废除,但均杳无音讯。对“排华法案”,司徒美堂感同身受,应广大华侨的要求,司徒美堂于1940年亲自给已经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写信,要求美国予以废除。10月,罗斯福总统虽咨文国会请废“排华法案”,但未果。1943年,司徒美堂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废除。罗斯福在当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请的“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,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的公民法案”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,实行了50年的不平等等“排华法案”得以取消。而通过一名华侨领袖推动美国的一项立法,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(摘自《中华儿女》宋清知/文)

成立安良总堂,并聘请罗斯福担任法律顾问近十年,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19世纪80年代,美国曾多次颁布“排华法案”,广大华侨社团纷纷向美国政府写信要求废除,但均杳无音讯。对“排华法案”,司徒美堂感同身受,应广大华侨的要求,司徒美堂于1940年亲自给已经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写信,要求美国予以废除。10月,罗斯福总统虽咨文国会请废“排华法案”,但未果。1943年,司徒美堂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废除。罗斯福在当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请的“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,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的公民法案”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,实行了50年的不平等等“排华法案”得以取消。而通过一名华侨领袖推动美国的一项立法,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“世界现代杂技之父”孙福有

“上至九十九,下至刚会走,吴桥杂耍技,人人有一手。”在吴桥,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谣,生动反映了吴桥杂技文化的广泛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。“世界现代杂技之父”孙福有就是吴桥人,他身上有什么传奇故事呢?

组建马戏团

孙福有,1882年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沟店铺乡孙龙村,6岁拜师学艺,练就一身精湛技艺;10岁随师外出表演,上京津、下高丽、闯关东,辗转几十个城市;20岁独自卖艺,出山海关一路闯荡到莫斯科,在一家杂技班当杂工。

工作之余,他仍不忘苦练技艺,同时潜心揣摩俄国杂技艺术。经过两年苦心钻研,已经能够出演《飞刀》《马叉》《钻刀门》等十几个节目。他的演技既有中国特色,又吸收了俄国杂技的精华,在莫斯科红极一时。

1920年,孙福有回到吴桥。1921年,他在国内正式组建了第一个马戏团——中华国术大马戏团,同时仿照欧洲马戏团的样式首创了演出大棚。他的俄国妻子莉莉夫人还帮忙训练了一支铜管乐队,在我国马戏史上,第一次将西乐用于马戏杂技演出伴奏。

世界规模最大

1923年,中华国术大马戏团在长江流域一带作巡回演出,当时《大鞍子马上丢球》《马背上火棒子》以及《空中飞人》等一批高难度节目令人瞠目,马戏团开始进入鼎盛时期。1926年,中华国术大马戏团南下东南亚,声誉日高,曾被泰国国王邀请到皇宫演出。

这时的孙家班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节目最齐全的马戏团,先后在30多个国家演出,在全世界影响很大。

1933年,黄河决口,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、流离失所,黄河赈灾委员会电请孙福有回国赈灾义演。孙福有率中华国术大马戏团经香港、汕头到上海,在上海虹口扎篷演出,两个多月收入二十多万大洋,悉数赈济灾民。在此次演出期间,孙福有结识了田汉、周扬、夏衍等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,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1945年,孙福有在重庆逝世,终年61岁,消息惊动整个山城,冯玉祥、田汉等著名人士都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孙福有一生从事杂技事业,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第一个大马戏团结束了,但他创造的剧团组织结构等形式都被继承了下来。(摘自《燕赵都市报》)



失物招领

简媛

这次,记住一个人的方式,从遗忘开始。

假日,我与先生一同自驾前往贵州千户苗寨,这是我俩第一次独自旅行。离开千户苗寨了,我们正在奔赴怀化洪江古城的路上。意识到自己丢了背包时,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近一小时。电话铃声响起,是女儿的英语老师打来的,我心里暗自着急:不会是女儿英语考砸了吧?“你是不是丢了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?”

“啊,丢包?”我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我在车里环顾一周,没有看见我的背包。我开始发慌。

很快,先生的微信收到了刘老师发来的一张照片。是我的包。一时间,我一头雾水,不知道这个包是不是独自穿越去了远方。“你真幸运。”刘老师接着又告诉我,她刚刚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,说他家人在贵州千户寨的

公厕里捡到一个

走丢的笔背包,包里有一

部手机。他从通话记录里看到“英语刘老师”这几个字时,他笑了。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觉得这个号码一定是个值得信任的电话。陌生人通过微信给刘老师发来了失物的照片。刘老师也不知道这个包是谁的,她把照片发在所教班级的家长群里,并发了失物招领公告。有家长说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去贵州旅游了。

一周后,我收到从四川德阳寄来的背包。打开包裹的那一刻,我百感交集。我既责怪自己粗心大意,又恍惚世间竟然还有这般真情。

怀疑不是无中生有,我曾经在火车上丢过人生的第一块手表,我在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丢了我为父母买回去的年货,我在一家新开的超市里丢了我的钱包,我在不知何处丢了我最喜欢的耳环……起初,我还抱有幻想,去打

听,也去派出所报案……可它们还是离开了我。我

也因此把“失去”二字刻在我心里,而它们似乎也理解了,总是在我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。

这个替我捡到背包的人,我一直没有见到他。联系到他时,我们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近两小时了。这件事过去两年后,我去四川绵阳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培训班,我给他发信息说我想去德阳拜访他。然而,这一次我还是没有见到他。

如今,我依然记得这件事,也依然记得这个人。即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,我想,这件事、这个人也是一辈子印在我的记忆里的了。也因此,在某些特殊的时刻,我心里总会自然奏响一些音符,它关乎幸运、陌生人,更多的是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如此珍贵,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希望与美好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元代刘一清所著的《钱塘遗事》,其材料多源于南宋时期的一些史实。书中对朝廷腐败、贾似道专权等现象多有揭露,还有一些南宋科考故事,因此这本书颇有补遗的价值。

书中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,耐人寻味。

当初,元宋联手,金灭。刘一清在文字中称蒙古政权为“北兵”“北朝”。

此后,元朝军队南下,势如破竹,攻下江州,又攻下安庆。刘一清笔下的“北朝”倏然变为“大元”。再后来,南宋兵败,元兵占领都城临安。刘一清笔锋一转,称“大兵入临安府”。

据说,当初拿破仑复辟,在历史巨变的时刻,巴黎一家媒体分六次进行了跟踪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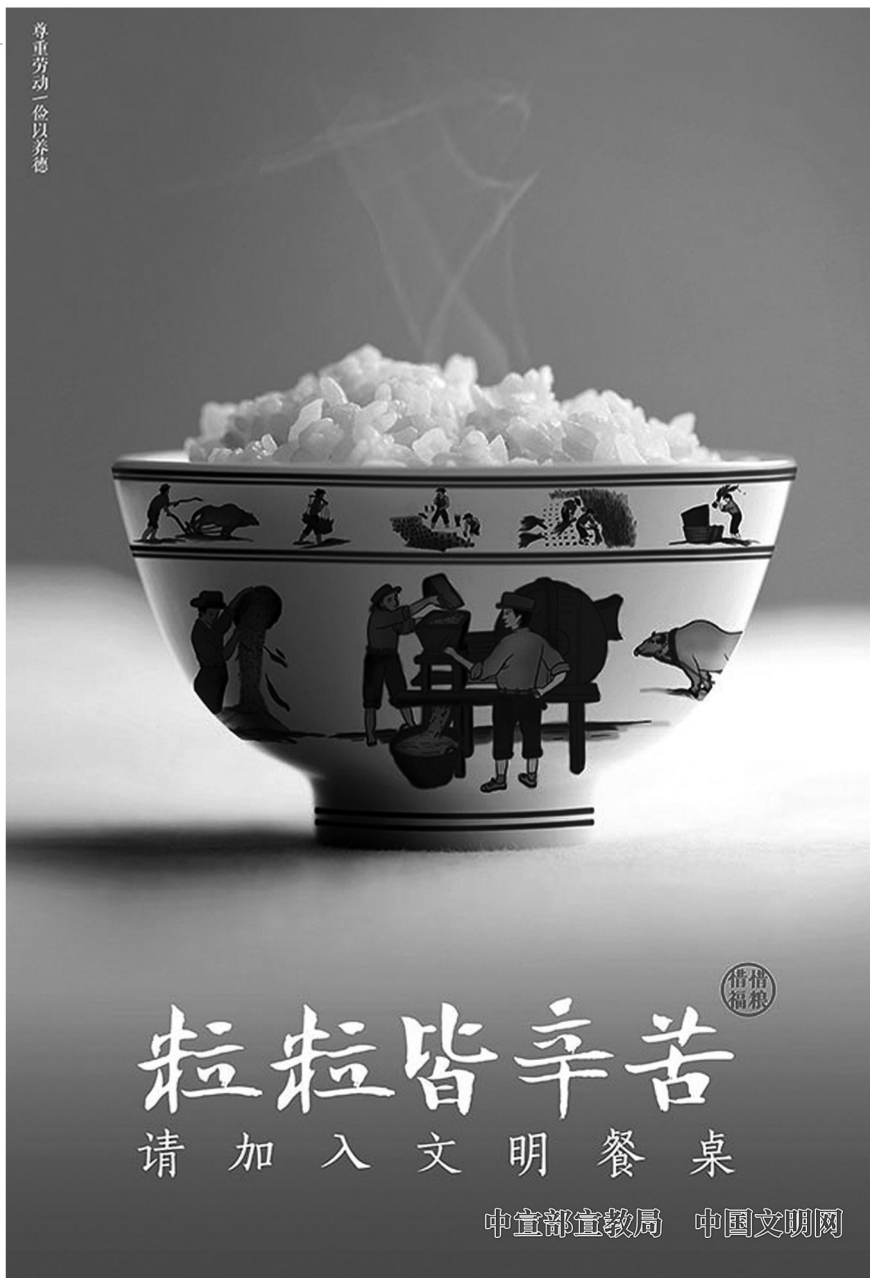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,“来自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”。第二次,“不可明说的吃人魔王向格拉斯逼近”。接着是,“卑鄙无耻的窃国大盗进入格尔勒诺布尔”之后是,“拿破仑·波拿巴占领里昂”“拿破仑将军接近枫丹白露”……最后,这家报纸发布了第六条,也是最新一条消息:“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。”

实力意味着一切。刘一清的前后矛盾和进退失据,与巴黎舆论风向的转换是同一回事。文人的笔墨,在铁骑和枪炮的威力面前,是如此不堪一击。

(摘自《华商报》)

脆弱

诗情



粒粒皆辛苦

请加入文明餐桌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